

交游、书信与书风传播

——黄庭坚戎州时期与王蕃的文艺互动再研究

李佳秋¹, 许宝文²

1. 西华师范大学, 南充; 2.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摘要 | 北宋贬谪背景下的士人跨地域书信往来, 是宋代“以文会友”传统的重要载体。本文以黄庭坚谪居戎州阶段与王蕃（王观复）持续数年的书信交流为核心个案, 依托山谷尺牘、题跋、年谱等一手文献, 梳理二人交游缘起、诗文论辩与书法互动的完整脉络。往来书札围绕去雕琢、守古法、崇平淡、重内蕴四大文艺主张展开深度切磋, 完整呈现黄庭坚成熟阶段的诗文、书学审美体系。这场异地文字酬答不仅推动苏轼一脉“尚意”文艺思想向巴蜀地区落地扩散, 也成为黄庭坚于贬谪逆境中完成艺术理念自省、完善的重要外部契机, 同时清晰展现出贬谪文人依托私人交游, 主导地方文脉建设、搭建跨区域文化传播网络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 | 黄庭坚; 王蕃（王观复）; 交游; 尚意书风

Copyright © 2026 by the author(s).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黄庭坚早年活动于长江、黄河中下游, 戎州远非其人生版图所及。然而绍圣、元符之际的蜀地贬谪, 却意外促成了其文艺思想的成熟。在交通艰涩、地域文化相对封闭的背景下, 黄庭坚并未消沉于流放之苦, 积极讲习授艺, 吸引川中士子纷纷从游。《宋史》称其“庭坚泊然不以迁谪介意, 蜀士慕从之游, 讲学不倦, 凡经指授, 尤以“两川人士争从游之”^[1]。中原主流学脉与巴蜀本土风气彼此激荡, 文教为之一新。遍检其诗文集及地方碑铭,

黄庭坚为蜀中友人创作的诗词、题记、碑铭存世甚多, 生动勾勒出当时士人群体的交游脉络。一众交游友人之中, 王蕃与其书信往还频繁、艺理切磋深入, 构成透视这一时期文化传播的重要样本。

2 黄庭坚与王蕃戎州之交的背景与渊源

汉砖文中所指“两汉”, 即为西汉（含新莽, 王蕃, 字观复^[2], 一字子宣^[3], 益都（今山东青州）人, 名臣王曾之后。宋哲宗元符（1098）年间在阆中任职^[4], 官至都大管干成都府等路茶事。其与黄庭坚定交的具体时间已难确考, 然据唐庚《送王观

作者简介: 李佳秋, 西华师范大学书法学院书法学在读本科生; 许宝文（通讯作者）,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为书法史论。

指导老师: 王动, 阿坝职业学院专任书法教师, 研究方向为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

文章引用: 李佳秋, 许宝文. 交游、书信与书风传播——黄庭坚戎州时期与王蕃的文艺互动再研究[J]. 现代艺术与传播, 2026, 1(3): 73-77.

<https://doi.org/10.68070/fn3v0836>

复序》“涪翁在黔中，观复以诗书相切磨”^[5]可知，绍圣三年（1096），黄庭坚谪居黔江时，二人已有诗书往来。至戎州时期，王蕃“多以书尺至戎州，从山谷问学”^[6]，通信愈趋频繁。

黄庭坚为王蕃取字“观复”，取《周易》“万物芸芸，吾以观其复”之义，寄寓于纷繁世事中体察循环之理、固守本心之期。此举既合北宋士林延请名流取字的雅尚，亦奠定二人以文艺相砥砺的交游基调。自此之后，王蕃便以“观复”为字行世，诗文、尺牍创作均以此署名。交游相关的还有其他记载，如：

“顿首。远承遣介惠书，勤恳勤恳，三复增叹。足下强学博闻，日新而不已。小人负罪，不得齿缙绅之末，岂敢如所推奖？且求博约琢磨之意，但愧慙自汗耳……”^[7]

“何字之诗，语气平而意深，论班固《汉书》中人物，理胜其文，不加藻饰，意其得师友，当为晚成之器……鲜澄温良有馀，但恐强毅不足，以读书少耳……公几时官满？代者为谁？度几时得去阆中也？未有会面之期，临书怀仰，千万强学自重。”^[8]

二人因共同的学术志趣结下深厚交谊，彼此为平等论学之友，并非单向的师徒问学关系。黄庭坚回信贴合王蕃治学思路，二人论艺具备充分针对性。黄庭坚在回信中对其“强学博闻”的肯定，以及平等切磋的态度，体现了贬谪文人在政治失意时，在地方确立起的文化权威与主体性。

王蕃身为地方官吏，不避道途迢递，屡屡修书问学，其动因主要有二：一是出于个人强烈的向学之心，黄庭坚屡赞其“强学博闻，日新而不已”；二是时代风气使然，宋代地方士人普遍向往靠拢以苏、黄为核心的主流文坛，期以追随当世文艺潮流。二人通信内容不限于诗文酬答，更涉及书法理论、人物品评、仕宦迁调乃至生活接济诸端，呈现出地位对等、双向切磋的文人交游模式，而不仅止于单向的求教问学。戎州时期频繁的书信互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尚意书风突破地理阻隔，正在向巴蜀地域渐次传播。

3 黄庭坚与王蕃交游中的文艺共鸣

黄庭坚与王蕃的文艺交游，于往返书札中得以呈现。作为尚意书风的核心倡导者，黄庭坚在以书信授艺论道的过程中，系统地将这一创作理念传至巴蜀士人群体。王蕃以勤勉笃学之态往复请益，二人之间逐渐形成的文艺共识，实为尚意书风在蜀地传播的重要渠道。

3.1 共尚自然，反对雕琢

黄庭坚阅王蕃诗后直言：“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并进而指出策问十篇亦“雕文胜耳”。

“……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策问十篇，思深虑远，佳作也，亦恨雕文胜耳……”^[9]

此非泛泛之评，而是尚意书风在方法论层面的具体表达。黄庭坚的回信中推崇杜甫诗，就是在表达书写佳句要不学时风、追溯源头、深入古法，“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以求“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之境，最终达到“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的自然天工。杜甫诗歌源于汉魏乐府，汉魏乐府又是承继《诗经》的“比兴”，由此层层深入古法，本质就是吸收前人的语汇、意象，理解诗歌背后的思维方式，再融入个人的情感，便能成佳作。黄庭坚在后续回信中也提到了乐府诗，“有乐府长短句数篇，谩往”^[10]。王蕃对此深以为然，后续寄诗渐入此道，黄庭坚亦以“有乐府长短句数篇，谩往”相酬，彼此在反对雕琢、崇尚自然的创作路径上形成共识。二人围绕“雕琢与自然”的反复探讨，正是尚意书风“尚意重韵、反对刻意”的主张从中心向地方渗透的微观写照。

3.2 溯源古法，力避时奇

黄庭坚在与王蕃的书信中，多次明确反对“好作奇语”。黄庭坚指出：“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此论直指尚意书风“入古出新”的核心要义。

“……南阳刘勰尝论文章之难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工’此语亦是沈、谢辈为儒林宗主时，好作奇语，故后生立论如此。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往年尝请问东坡先生作文章之法，东坡云：‘但熟读《礼记·檀弓》，当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读数百过，然后知后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观日月也。文章盖自建安以来，好作奇语，故其气象衰飒，其病至今犹在。唯陈伯玉、韩退之、李习之、近世欧阳永叔、王介甫、苏子瞻、秦少游乃无此病耳。公所论杜子美诗，亦未极其趣，试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峡年月，则诗中自可见……”^[11]

“公学问行己之意甚美，但文章语气务奇诡，不平淡。昔东坡尝云：‘熟读《檀弓》二篇，当得文章体制’此确论也，愿以此求之。”^[8]

黄庭坚作为苏轼书学思想的全盘接收者，转述

苏轼“熟读《檀弓》”的教诲，将苏轼书学思想经由书信传递至巴蜀：“往年尝请问东坡先生作文章之法，东坡云：‘但熟读《礼记·檀弓》，当得之。’”这一转述行为本身，即构成苏轼书学理念通过黄庭坚在巴蜀地域再传播的确证。黄庭坚在与王蕃的交游中阐述苏轼的方法论，不仅是在传授个人心得，更是在巴蜀地区系统地构建和传播一套以“深入古法”为核心的、对抗时风流弊的创作纲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秦观接续推进古文运动，承袭韩愈“文以载道”的理念，倡导文学复古，促使创作回归思想内核：或寄寓抱负，或观照现实，或抒写真情，文风刚健开阔、质朴自然，摆脱刻意求奇、格调萎靡的弊病。黄庭坚援引历代先贤为佐证，立足文学史事实，以恳切坦诚的态度与王蕃论学交流。二人追溯历代先贤，以证“文以载道”、摒弃浮华之理。二人于“取法乎上”的路径上达成的高度默契，不仅是个体间的文艺共鸣，更是尚意书风理论体系在巴蜀地方的系统性展开。

3.3 求平淡自然，去斧凿之痕

黄庭坚主张学习当“沉潜于经术，自印所得”，待“根源深远，则波澜枝叶无遗憾矣”。他反复以杜甫夔州后诗为例，赞其“平淡而山高水深”“无斧凿痕”，将“拙多于巧”“平淡自然”标举为诗文书法的共同最高境界。

“……闻足下饮食宴乐，出入车马，无不在于学，如此古人乃不难到。更愿加求己之功，沉潜于经术，自印所得。根源深远，则波澜枝叶无遗憾矣……”^[12]

“……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9]

以上记载，黄庭坚书法审美——“心不知手，手不知心”的创作方法与“入则重规迭矩，出则奔轶绝尘”的创作主张——完全一致。王蕃在书信往来中持续输出诗作、策问及乐府，黄庭坚则逐一指点、点定旧作，二人围绕“平淡”“无意”的反复切磋，实为戎州时期黄庭坚艺术理念从“内悟”走向“外化”的重要途径。正如陈志平所论，此期黄庭坚破除禅律束缚、重新认识草书法度，而本研究表明，这种个体化的心性转变并非在封闭中完成，正是通过与王蕃的往复论学得以巩固和传播。黄王交游可视为“内悟外证”的典型个案——黄庭坚的内在书学转向，借由与蜀地土人的互动，实现了由个人体悟向群体认知的扩展，尚意书风由此在巴蜀之地生根发芽。

3.4 重胸中学养，求言必有据

与“尚方大篆”的风格描述十分相似的“缪黄庭坚为王蕃取字‘观复’，源自《周易》；为鱼太守题‘整暇堂’匾，典出《左传》。

“鱼守求堂名，辄书‘整暇堂’三字去，事出《左传》。”^[18]

“顿首。承鱼仲修待程信孺来，遂解印，便欲作整暇堂意记去。”^[18]

此二事皆表明：凡命名、题字，必求经典出处，方可谓“言之有物”。黄庭坚更将此理念引申至书法创作：“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胸中”二字也是时常出现在黄庭坚的诗、词、文中，如“为扶起樽前，醉玉频山。搜揽胸中万卷，还倾动、三峡词源”^[13]，宴会乘兴赋诗也需从胸中搜寻积累的学识。

纵观书学理论与实践行为，书法上，黄庭坚同样遵循此法：“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14]，胸中有韵，才可发乎纸上，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也^[15]。他评王著“临帖妙绝”却“书不病韵”尚嫌不足，正在于“胸中有书数千卷”的积累有所欠缺。此即尚意书风“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核心观念——书法的“韵”不独赖技法，更需学识与品格为根基。

王蕃对此深有会心，其“强学博闻，日新而不已”的治学态度，恰与黄庭坚“胸中有物”的要求相契合。二人围绕经术根柢与文艺表达之关系的反复讨论，使尚意书风“以学养韵”的理念在蜀地得到切实的接受与实践。

“……所欲作大字，会臂痛，勉书之，不能工，不知堪用否？小字得当俟他日也……”^[16]

“……旧诗一卷，皆叶县尉时所作，亦漫点定，并去年所送一册同往……”^[8]

北宋时期诗文与书法密不可分，对于北宋文人而言，书法是日常书写工具，更是诗文精神的延伸。黄庭坚手书旧诗一卷、点定王蕃诗作，于笔墨间将诗文精神与书法意趣合而为一，王蕃由此不仅在义理层面领悟尚意书风之精髓，更在实物层面亲炙山谷书迹，获得理论认知与艺术感受的双重滋养，在品读诗文的同时，亦能从笔墨间感受黄庭坚的书法意趣与人格气象。

4 黄庭坚与王蕃交游的书迹遗存与书学共识

持续近三年的文艺对话，在元符三年（1100）黄庭坚即将离蜀时期达到高峰，此时黄庭坚书风历经谪戎期间的笔法悟道，已臻新境，与王蕃的书法交游尤以《砥柱铭卷》最具象征意义。此卷为大字行书，凝练有力，是笔法变法后的书法代表作品之一。

《砥柱铭》文本取自魏徵所作铭辞，内容是颂大禹治水之功与唐太宗德政。黄庭坚一生多次遭遇贬谪，便想以“砥柱精神”自勉，希望自己能像砥柱山一样，在困境中坚守正道，亦欲以此激励后学，希望晚辈要像黄河中的砥柱石山一样，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在世道艰难时保持气节。其《跋砥柱铭后》明言：“营丘王蕃观复，居今而好古，抱质而学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愠者也，故书《砥柱铭》遗之。”^[17]此跋语择取《周易》“立不易方”与《论语》“人不知而不愠”二典，已非寻常赠物之辞，而兼有以经义印证品格、以书迹承载期许的双重用意。黄庭坚以《砥柱铭》相赠，既是对王蕃人格的肯定，亦寄寓始终坚守正道之期许。黄庭坚将精神气格化为笔墨语言，二人交游遂由技艺传授上升至精神共鸣之境。

王蕃书法真迹虽已不存，《山谷题跋》中《题王观复书后》一文却保留了珍贵品评记录：“此书虽未极工，要是无秋毫俗气。盖其人胸中磊磊，不随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气可掬者，又何足贵哉！”^[18]此跋语展示了黄庭坚对王蕃书法的赞赏，在“未极工”与“无俗气”的对举中可析为三层递进，其一，“无秋毫俗气”直指书作气息之纯净，对应黄庭坚一贯标举的“不俗”观；其二，“胸中磊磊”“不随俗低昂”揭示书迹背后的人格支撑，与“胸中有道义”的书学主张一脉相承；其三，以时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气可掬”为反衬，鲜明提出“以精神境界胜于单纯技巧”的价值判断。此番正是“拙多于巧”“不俗”“不做好奇语”诸项书学主张在具体品鉴中的集中映现。

黄庭坚初见王蕃诗文，直言其文字雕琢过重、刻意求奇，辞句生硬缺乏含蓄之韵。受山谷书信点拨后，王蕃潜心研读杜甫夔州后诗作与《礼记·檀弓》，时时寄新作至戎州请其删改，主动依照山谷“去雕琢、尚平淡”的标准修正文风。多年切磋之后，二人荆州再会，黄庭坚于《答王观复》其二称许：“诗句稳实，殊进于旧，钦爱钦爱。”前后评语对比，足见王蕃诗文的明显转变。

“两日车马之音阒然，方切咏思，辱教，慰释无量。诗句稳实，殊进于旧，钦爱钦爱。土宜之惠过当，感愧感愧！”^[19]

《全宋诗》收录其《凤巢山》二首，诗作依托元人《宋诗拾遗》保存，无后世伪作嫌疑，是其受山谷指点后的成熟作品：其一，古邑荒凉瞰小溪，青山高与白云齐。凤凰飞去巢阿阁，未肯重来觅故栖。其二，凤凰飞去听箫韶，燕雀群飞想见嘲。记取旧时栖止处，莫教鹰隼误来巢。

全诗摒弃生僻冷僻的典故铺陈，借凤凰意象寄托守正自持的士人胸襟，冲淡质朴的文辞之下暗藏

深远意蕴，完全契合黄庭坚一贯推崇的平淡审美范式。现今并无王蕃本人的书法真迹留存世间，后世仅能依托《山谷题跋》所载文字评述推究其书学追求。王蕃能够跳脱当时书坛追逐雕琢花哨笔法的流俗，以自身经年累积的学识涵养充实笔墨气韵，切实领会尚意书风重视士人品格与内在精神底蕴的核心内涵。黄庭坚前后两次对王蕃诗文作出差异鲜明的评价，结合《全宋诗》保存的王氏诗作相互参照佐证，足以说明王蕃并未仅在往来书信中空泛认同黄庭坚的文艺理念，而是将去雕琢、崇平淡、以学养韵的审美标准落实到自身诗文创作之中，为苏黄一脉尚意文艺思想在巴蜀地域的传播留存下可靠文字佐证。

黄庭坚与王蕃依托书信往来、书迹互鉴开展的文艺交流，是宋代文人士子赓续文脉、传习艺道的微观实践载体。黄庭坚向王蕃传授“平淡”为核心的书法审美范式，立足自身贬谪戎州的人生境遇，跳出仕途进退的功利评价体系，重塑宋代士人安身立命的精神主体。以个人书学理念与文艺修养为根基，黄庭坚在地方圈层搭建起兼具精神坚守与审美传播价值的文艺交流体系，形成专属的文化传播阵地。时代变革浪潮席卷北宋朝野，仕风、文风随之更迭流变。黄庭坚与王蕃于逆境中坚守艺道本心、深耕书学交流，二人纯粹真挚的文人情志与治学追求，成为北宋文艺发展进程中极具温度与力量的精神缩影。

5 结论

黄庭坚贬居戎州期间与王蕃持续数年的书信往来，是其人生后期文艺实践与思想建构的关键一环，在宋代巴蜀文艺交流史上有着独特价值。书信作为二人远距离论学的载体，搭建起连通中原主流文坛与巴蜀地方士林的文化通道，成为尚意书风向外传播的重要渠道。不同于单向的师徒授受，黄庭坚、王蕃二人以平等友人身份切磋诗文、研讨书法，黄庭坚系统阐发去雕琢、崇平淡、重学养的创作标准，王蕃则不断寄送新作求教，在反复打磨中完成文风与书风的转变，形成双向交流、彼此启发的良性互动。黄庭坚赠予王蕃《砥柱铭》，既以笔墨寄托坚守本心、不随世俗的人格期许，也将“不俗”“胸存道义”的核心书学观具象化，把文艺审美与士人精神品格融为一体。二人千里论艺的交往模式，代表了元祐贬谪文人群体依靠私人交游延续文脉的真实状态。这段跨地域的文艺互动，既促成黄庭坚诗文、书学理论的最终成熟，也推动苏黄尚意文艺思想在巴蜀落地生根，充分体现宋代文人以书信酬答、以文艺相交的精神传统。

参考文献

- [1] (元)脱脱,等.撰.宋史 卷四百四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110.
- [2] (宋)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 卷二十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936:648.
- [3] (清)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 卷三十七[Z].清光绪刻本:1647.
- [4] 朱安群,等.译注.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黄庭坚诗文选译修订版[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200.
- [5] (宋)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 卷二十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936(四部丛刊三编景旧钞本):648-650.
- [6] (宋)黄芾.山谷先生年谱 卷二十八[M].吴兴:乌程张氏,1913—1917(适园丛书本,私刻):648-650.
- [7] (宋)黄庭坚,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中[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938.
- [8] (宋)黄庭坚,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中[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943.
- [9] (宋)黄庭坚,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中[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940.
- [10] 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938-939.
- [11] 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939-940.
- [12] (宋)黄庭坚,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中[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939.
- [13] (宋)黄庭坚,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中[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1328.
- [14] (宋)黄庭坚著,白石校注.山谷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84.
- [15] 陈志平.黄庭坚书学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4.
- [16] (宋)黄庭坚,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中[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942.
- [17] (宋)黄庭坚著,白石校注.山谷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04-105.
- [18] (宋)黄庭坚著,白石校注.山谷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14.
- [19] (宋)黄庭坚,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中[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1115.

Social Networks, Correspondence,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Literary Styles

—— A Re-examination of Huang Tingjian's Literary Interactions with Wang Fan During His Stay in Rongzhou

Li Jiaqiu¹, Xu Baowen²

1.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2.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The cross-regional correspondence among scholars under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exile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erved as a vital vehicle for the Song Dynasty's tradition of "bonding through literature." This paper takes the sustaine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uang Tingjian, during his period of exile in Rongzhou, and Wang Fan (Wang Guanfu) as a central case study; drawing upon primary sources such as Huang Tingjian's letters, inscriptions, and chronological records, this study traces the complete trajectory of their scholarly interactions—including the origins of their relationship, their poetic and literary debates, and their exchanges in calligraphy. These correspondences engaged in profound discussions centered around four core artistic principles: avoiding excessive ornamentation, adhering to classical conventions, valuing simplicity, and emphasizing inner depth, thereby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presentation of Huang Tingjian's mature aesthetic system in poetry, prose, and calligraphy. This correspondence not only facilitated the dissemination of Su Shi's lineage of "emotive-oriented" artistic thought throughout the Ba-Shu region but also served as a crucial external catalyst enabling Huang Tingjian to undertake self-reflection and refinement of his artistic philosophy amidst the adversities of exile; simultaneously, it clearly demonstrates the unique value of exiled scholars in leveraging private social networks to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establish cross-region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tworks.

Keywords: Huang Tingjian; Wang Fan; Literati Communication; "Shangyi" calligraphic style